

徽州商业文献分类及价值

陈联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徽州商业文献以量多、涉及面广、富有地方特色著称,其中主要包括水陆路程书、商业技能与规范文献,以及会馆录等,涉及到当时的水陆交通、商业道德、经商技能和产品工艺流程等诸多内容,对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及徽州商人等有很大的价值。

关键词: 徽州商业文献分类文献价值

明清时期的徽州素称“东南邹鲁”、“文献之邦”,其作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自南宋以来开始形成,明中叶以后,徽州文风更为昌盛。徽人十分重视教育,“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徽州的书院、学塾、文会遍布城乡。教育的发达不仅促进了徽州文化的繁荣,造就了庞大的中式出仕群体,更重要的是,使徽人整体文化素质保持了较高水平,徽人著述相应也大量地产生。与此同时,徽州雕版印刷业也盛极一时,据嘉靖《徽州府志》记载,早在明嘉靖以前,徽州“刻铺比比皆是,时人有刻,必求歙工”。徽州文献由此得以大量地向外传播并留存下来。据我们的初步调查摸底,徽人著述总数在 7000 种以上,目前存世也当在 4000 种以上。¹另外,未见著录的徽人文献仍不断被发现。

徽州文献数量庞大,精品颇丰,涉及面也非常广泛,并富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而商业文献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徽州商业文献主要是指徽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徽商)为指导商业经营或记录自身商业等行为而著作或传播的文献材料。徽商是明清时期地域商帮的典型,也是徽州文化得以兴盛的基础。徽商“贾而好儒”,自身的文化水平较高,在经营和生活中能弘扬儒家道德规范,善于总结经商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以之自律并教育后辈从业者。正是这种“好儒”情结和总结经验的需求,使徽商勤于著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徽州书商以商书射利,这样更使商书得以广泛传播。

徽州商业文献主要包括水陆行程书、日用类书、商贾便览、士商类要,以及会馆录、会馆征信录等,按其内容和用途可分为以下四类。而从广义上来说,徽商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契约、合同、收借据、路引税票、账册、诉讼案卷抄白等也属商业文献范畴,限于眼界与篇幅,此类文献不在本文涉及范围。

一、水陆路程书

水陆路程书是指记载地理、水陆交通路线及各地关津、风尚等方面知识的文献。其重要性,正

如明人在《合刻水陆路程》叙中所言：“舟非水不行，车非陆不至，乃水陆莫不有程途。无程途，滔滔天下令人迷津，茫茫山河令人裹足。行必由径，纂人迷途，故差毫厘失之千里。”而此类文献中，由徽人编撰的为数甚多。明清时期，徽州“商贾四出”，“牵车牛远服贾”，四外奔走，从事远距离的商品贩运贸易。对于他们而言，了解有关的路程距离、交通状况、关津、民俗、物产、市集、码头等常识是他们经营的必需。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徽商编印了大量的路程书。

徽商编著的路程书以休宁商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²最为著名。该书刊于隆庆四年（1570），是留存至今最早的商书之一。据作者在自序中介绍，他年及弱冠，即随父兄外出经商，足迹遍及宇内。后侨居苏州，与全国各地及海外商人进行贸易。在经商生涯中，他留心考察并记录各地交通途程及民风民俗，并参考各种舆地图志，详加考辨，历时 27 年才成书。该书共有八卷，第一、二卷介绍两京至十三布政司的水陆途程；第三卷记两京及十三布政司到所属各府的水陆途程；第四卷述东起开原卫、西到嘉峪关的各边途程；第五、六卷为江北水陆途程；第七、八卷为江南水陆路程。书中不但详细介绍了各地道路的起止分合、距离、行走难易和水陆驿站名称，其他如食宿条件、物产行情、治安状况、车船运费等兼也涉及，“大为天下利益”。其中有的记载颇能补史志之不足，如在“芜湖县由东坝至无锡县”的道路中，即载有“（由无锡）避大江去芜湖者，此路近便无盗”。这些材料对研究明清时期的商运路线而言，弥足珍贵。

除此之外，徽人编纂刊刻的路程书还有清代休宁商人所编的《江湖绘画路程》等，而抄本为数更多。这些途程文献，多以两京和苏州为起点。另外，由于为徽人所编撰，对以徽州为起点的路程也多所侧重，甚至有些途程书专以徽州为起点。如《客孤思乡》³中，首载“徽由东流水路至汉路程、湖口县至徽州府路程、休宁县至汉路程歌诀”等，后载由湘潭至南京水路图记，并附有《休宁县都图地方字号便览》。此外还有歙县江氏茶商的《徽州至广东路程》、《沐雨栉风》、《万里云程》等。徽商多将其随身携带，以资参考，有些采用小件折叶装，使用十分方便。这类文献虽皆有所本，但却经过传抄者的增删订正，特别是加入了自身的经历和体验，这样就使有关路程的知识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徽商熟知了这些路程知识，不但能缩短运输时间，减少运输费用，确保人身与货物的安全，而且可以避免购销过程中的盲目性和被动局面，以及与客户相互沟通的困难，从而在商业经营中能做到的放矢，无往而不胜。

路程书的大量编撰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明清时期，随着远距离贸易的不断发展，商人的经营地域也不断扩大，对商业地理方面知识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我们今天通过对商运路线及相关方面内容的发掘与研究，可以具体而微地了解当时区域市场的划分、市场网络的构建、各种商品的生产和流向。另外，这类文献所保存的社会史、文化史，以及水文、水利方面的记载虽略显零散，但多属第一手材料，可以补正史之不足。

二、商业技能与规范文献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徽商学习与总结了许多经商的经验。他们中许多人往往将这些经验记录下来，一方面用以随时稽考，另一方面也是为学徒或初从商者提供指南，以便使他们能尽快地适应

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这一类文献以程春宇的《新安原版土商类要》（其中也载有途程）最为有名，而《客商规略》、《典业须知》类文献留存下来的也很多。另外徽州书坊刊刻的《酬世锦囊》、《万宝全书》、《士民便考杂字》等日用类书中，也辑有许多类似的知识。

此类文献内容一般包括：商业道德与商业规范、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道、市场行情与关税税则、天时占验及风暴日期、商业交易的技巧、商品货币质量与真伪的辨别、各地牙行的虚实与可信度、路途中的防盗与防骗手段、政府法律法规与地方性的行规、学徒入门的行为规范、商家的禁忌与习俗等。据其内容或用途，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 商业经营的一般性原则和技巧类文献

这类文献的出现似乎和当时箴书广为流行分不开，其中《客商规略》⁴可以称得上这种文献的典型。该书共分六个部分，分别为《客商规略》、《贸易赋》、《经营说》、《为客十要》、《处世格要》、《行路图及行路歌》等，其中内容芜杂，前后多有重复，但基本上概括了经营中所要注意的各项事宜。如商业道德方面，“高年务宜尊敬，幼辈不可欺凌”；守法方面，“凡出门，先告路引为凭，关税不敢阻滞，投钞不可隐漏”；交接应对时，“务宜察颜观色，必要避恶向善”；安全方面应“早歇晚行，逢市可住”；行情方面，“既走江湖，须知丰歉”；时机把握方面，“迎头快者不可买，迎头贱者不可停”、“买卖莫错时光，得利就当脱手”等等。此类文献以抄本数量居多，名称亦各有不同，如《士商必要》、《买卖机关》、《经营说》等。且多为因袭前人著述，但对经商知识的传播起着极大的作用。

2. 学徒入门教材文献

这类文献一般都明确地指出了编撰的目的，如《生意经传》所言：“余著斯言，为目击心警，犹耳提面命，而初学者可以温习盘桓，深究玩味。”⁵又如《典业须知》指出：“汇成一册，以劝将来……分送各典，使司业后辈，从案头藏置一本，得暇熟玩，或当有观感兴起者。”⁶其内容也有很明确的针对性，《生意经传》开篇即提出，“学小官，第一受规矩、受约束”，“若要会，人前累”。同时也指出，学生先得学习做眼前一切杂事，手脚要勤快，反应要敏捷。要虚心听受师友指点，面对顾客要举止庄重，应对从容，勿要沾染恶习。要抓紧空余时间习学辨识银水光洋，练习算法笔墨。《典业须知》甚至提出了对不守徒规者的惩罚措施：“倘遇（学徒）不肖者，会馆出场驱逐。”

上述文献一般为特定行业的学徒而作，有相当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内容差别也较大。而且此类文献很少向社会广泛传播，近乎于秘本的性质，所以其中的内容甚至有不便于公之于大众者。如《生意经传》中，即有“生意不比古时，以老为实，彬彬板板。目今你若依古时做生意，则鬼也没得上门。而且时下须得言如胶漆，口如蜜罐，花描之至，还要带三分奉承……但今世俗，宜假不宜真。又道是‘一天卖得三个假，三天卖不得一个真’”等真实体验。

3. 技术和行情类文献

虽说商业经营只是贱买贵卖，主要依据的是技巧与时机的把握。但辨识货币物品成色、质量与

真伪的技能，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货物质量良莠不齐、货币苦良夹杂的现象。为此，徽商编撰了许多辨识质量、成色的文献。如《典业杂志》⁷中的《管见集》部分即录有“论珠、论玉器、皮货论、炼赤金法、水称包金法、附水称法、试验金钢钻真贋法、平规指掌”等内容。而在一些特定的手工行业中，各有技术指标和品质要求，徽州商业文献中也多有此类的记载。如《油坊备要》中，就载有油料的种类、制作过程中的工艺要求、工具的种类与式样等方面的内容。

徽商也十分注重市场行情与运销成本的核算，他们往往将这些内容辑录成册，随时增删订正，以便稽查。这种文献个人化因素更为浓厚。如《商情杂览》⁸就辑录了“青邑米行规则、西省售纸行规、袁州表刊印（费用）、吴至通完厘章程，金牛办炮料纸费、南昌办瓜子装民船费用规则”等。这类文献对徽商掌握各地货物的品质与价格、计算商品的运销成本、决定买进与抛售的时间与地点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上三类文献及路程书类文献内容各有侧重，互有重叠，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上述分类应该说十分粗略。这同时反映了此类文献编撰过程中的两种倾向：一种是综合性。事无巨细，只要与经商相关，尽量将其收入，以备各种不时之需。这种文献就类似于商业上的“百科全书”。另一种是专业性。把某一经营项目相关各项环节中所涉及、或特定人群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汇编起来。这种文献也就类似于“专业指南”。分别从广度上与深度上进行编撰，可以说是这类文献的主要编撰原则。

商业技能和规范，不仅是当时商人所必须具有的知识和修养，对今天而言也有很大的价值。从商业规范文献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传统商业道德中值得继承的方面。其中反映的徽商的经营理念，如崇尚信义、以义取利、追求效益、加快周转、注重质量、讲求信誉、重视信息、知人善任等，仍然值得现在从事工商业者借鉴；而商业技术方面的记载，对传统工艺的发掘和继承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会馆类文献

商人会馆是旅外同乡所建立用以联结乡谊、办理慈善事业的一种设施，因其为商帮的物化符号与权威中心而又成为同乡组织的称谓。会馆是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和流动频繁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中产生的，它既是明清社会变迁的产物，也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起了一定的作用。会馆一般由义冢、义所善堂演变而成，其日常功能以办理慈善事业为主，同时也兼及其他事项。徽州商人历来重视宗亲乡谊，乐于“以众帮众”，在徽商集中的地区多建有会馆。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徽商会馆至少有百所以上。在会馆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徽州商人多将会馆的建立缘起、条规、账目出入等汇编成册，“以征信来者”。留存至今的《会馆录》、《会馆征信录》等当有二十种以上。就其类别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会馆录》、《□□会馆征信录》。此类文献直称“会馆”，是最为典型的一种会馆文献，如《重新南京新安会馆录》等。

二、《□□堂征信录》。此类文献留存数量最多，其中所记载的建筑按功用可分为两种：一种完全等同于会馆，如《徽宁思恭堂征信录》等，另一种似乎单纯是善堂，如（南昌）《徽郡遗爱堂征信录》等。

三、《□□书院志》。如（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就其名称而言，应该是书院的记载，但许多徽商会馆亦称“新安书院”、“紫阳书院”，汉口的紫阳书院既是徽商的一种旅外教育机构，同时更是会馆类设施与组织。

四、《□□公所征信录》。如（杭州）《徽商公所征信录》、（上海）《星江敦梓堂（公所）征信录》。这类文献多为徽商某一行业公所的文献汇编，上文提及的徽商公所为徽州旅杭木业所建，敦梓堂为在沪婺源茶商所建。

五、会馆中某一设施的记载。如《新安义园征信录》专载常熟梅园公所的义地的四至、形状；《徽宁医治寄宿所征信录》所记的设施则是上海徽宁会馆的附属机构。从广义上来说，上述文献都可称作会馆类文献。

会馆类文献一般在重大兴建后重修，也有的数年一增修。如《徽宁思恭堂征信录》，三年一增修；杭州《新安惟善堂征信录》，⁹十年一增修。会馆类文献内容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为序。所记多为会馆的建立缘起、沿革等，从中可得见会馆兴废之貌。二为公牒。一般包括倡建者请求官府保护会馆财产的禀文与官府的告示。三为契约。主要是建立会馆时地权买卖的凭证。四为规条章程。主要记载会馆运作的一些方式、限制、奖惩措施等。五为图记。记载公馆房屋的四至、式样及义园的四至与方位。六为捐输芳名。记载捐助钱物的同乡个人姓名或团体名称及捐输数量。七为开支。记录会馆日常运作、运柩代葬及房屋维修的支出。另外，少数会馆文献中也有会馆诉讼、与其他团体往来、救助同乡等方面的内容。

会馆类文献虽鲜有徽商经营的直接记载，但对研究徽商的网络、徽商的自我保障体系、徽商的组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新安惟善堂征信录》、《徽宁思恭堂征信录》及《登善集征信录》等记载中，我们能发现以杭州惟善堂为中心，各地会馆善堂为纽带，苏浙地区形成了运送徽州旅榷归葬的庞大网络。而这种网络同时也将各地徽商的组织联系起来。互通声气，共同处理同乡的公益事宜，进而互相交流商业信息。从《徽商公所征信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徽州木商网络的运行。

对徽商会馆类文献的发掘，也对深化会馆研究起着促进作用。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会馆研究就是明清经济史及中国近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研究主要使用碑刻及笔记方志中零散的

记载,运用会馆录特别是商人会馆录进行研究尚不多见。如果以徽商会馆为切入点,运用为数颇多的徽州会馆类文献,再结合其他方面的记载详加考察,必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明清时期会馆的结构和功能。

四、宣传类文献

这类文献主要是从事手工产品制作与销售的徽商所编撰,其目的则是为扩大自己产品的影响,在竞争中获胜。如明朝中后期,歙县著名墨商方于鲁为自身产品的宣传,在万历十六年编纂了八卷本的《方氏墨谱》,书中录有各式墨品 358 种,皆出自当时著名画师刻工之手。方于鲁还邀请了汪道昆兄弟分别作《墨赋》、《墨铭》、《墨书》附于卷首。书成之后,方氏制墨的声名亦随之鹊起。与方氏同为制墨名家的程大约兄弟也不甘示弱,他们随即于万历二十二年编撰《程氏墨苑》。该书也主要是墨样集,分玄工、與图、人官、物华、儒藏、缙黄六类,共收墨品 500 式。后并附有人文爵里及时人投赠诗文,有的版本末尾还附有《中山狼传》与《续中山狼传》等文,以攻击方氏。其图绘、雕镂、彩印、装帙之精美,更胜于前者。另外,徽商所开药店与新安名医也常刊刻标有自己字号、店名及经营地点的药方,向四方传布,这类药方虽未成册,内容亦以方剂为主,但从其刊刻的目的、流播的广度和方式而言,似乎也可归为商业文献之列。

徽商研究能在近二十年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高水平论著文章不断涌现,离不开《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等文献的出版,而为使徽商研究进一步深入,同样也离不开对数量巨大、内容广泛的徽州商业文献及文书档案的发掘与利用。同时,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诸方面,如历史地理、地名学、交通史、商业道德、传统科技与工艺、社会变迁,甚至艺术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The category and value of Huizhou commercial documents

Chenlian

Abstract: Huizhou commercial documents are noted for their magnitude, content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nsist chiefly of volumes about waterway and overland route in ancient China, traditional trade skills and criterions, Huizhou Huiguan. It touches upon traffic, trade morality, trade skills, manufacture technique and process, etc.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y Huizhou merchant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¹ 胡益民等:《徽州文献与〈徽州著述叙录〉的编撰》,《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² 《一统路程图记》,又名《天下水陆路程》等,隆庆四年刻本,八卷,《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66册。

³ 《客孤思乡》,咸丰二年抄本,不分卷,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⁴ 《客商规略》,清抄本,不分卷,安徽省图书馆藏。

⁵ 《生意经传》,清抄本,不分卷江敷五传抄,据其内容可确定为常州徽商编撰,安徽省图书馆藏。

⁶ 《典业须知》，清刻本，杭州新安惟善堂刊，北京图书馆藏。

⁷ 《典业杂志》，民国初年抄本，不分卷，忤因主录，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⁸ 《商情杂览》，清末抄本，不分卷，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⁹ 《新安唯善堂征信录》，光绪十七年刻本，两卷。南京图书馆藏。